

# 帝国春秋



海 国 图 志

林国基 主编

第一辑

四帝国理论（约瑟夫·沃德·斯文）

亚西比德与雅典僭政（王恒）

培根的帝国主义（霍华德·B·怀特）

白鲸与美国的政治象征（艾伦·海默特）

瓦莱里乌和普布里可拉谈话录（詹姆斯·哈林顿）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 帝国春秋

● 林国基 主编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帝国春秋 / 林国基主编.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8

(海国图志丛书)

ISBN 978 - 7 - 208 - 08099 - 7

I. 帝… II. 林… III. 世界史—研究 IV. K1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36145 号

责任编辑 刘海滨 蔡欣  
装帧设计 王小阳



世纪文景

## 帝国春秋

林国基 主编

出 版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出 品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100027 北京朝阳区幸福一村甲 55 号 4 层)

发 行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35×965 毫米 1/16

印 张 18.25

插 页 2

字 数 200,000

版 次 2009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208 - 08099 - 7 / D · 1429

定 价 28.00 元

## 总 序

“海国图志”书系属于生者，为生命及其动力服务。它既属于行动的人和强有力的人，也属于受难的人和需要解放的人。不过在一个特别的意义上，它严格地属于行动的人和强有力的人，正是这些人在进行一些伟大的事业和斗争，他们尤其需要模范、指导以及至关重要的安慰。

是为序。

“海国图志”书系编委会

二零零八年十月

# 目 录

- 1 帝国春秋  
3 四帝国理论(约瑟夫·沃德·斯文 撰,王恒译)  
28 亚西比德与雅典僭政(王恒撰)  
50 培根的帝国主义(霍华德·B. 怀特 撰,王恒译)  
80 白鲸与美国的政治象征(艾伦·海默特 撰,徐爽译)
- 131 立法的艺术  
133 培根的《新大西岛》(肖厚国 撰)  
173 立法家的疯狂:梭伦是如何推翻“萨拉米法令”的?  
(郑文龙 撰)  
186 作为政治哲学的修辞(程志敏 撰)
- 215 君主之鉴  
217 撒路斯特的“阴谋”(刘晨光 撰)  
225 弱者的法律世界(林国荣 撰)
- 237 虚拟对话  
239 瓦莱里乌和普布里可拉谈话录:或平民共和国的真实形式  
(詹姆斯·哈林顿 撰,王军伟译)

---

# 帝 国 春 秋

---



# 四帝国理论<sup>\*</sup>

约瑟夫·沃德·斯文 撰  
王 恒 译

—

3

《但以理书》的一个著名段落描述了尼布甲尼撒关于一座塑像和一块石头的梦。塑像由金、银、铜、铁构成，脚混有泥土和铁；石头砸碎了巨像，并开始疯长，直到它充满了整个世界。但以理认为这个梦与四个伟大帝国相关，随后将产生一个摧毁其余并永久存在的第五帝国。这一观念在后文的数章中以四兽的异象被重述，“一位像人子的”跟随其后，得了“权柄、荣耀、国度，使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侍奉他。他的权柄是永远的，不能废去。他的国必不败坏”。<sup>[1]</sup>

现代学者似乎相当同意，《但以理书》成形于公元前 168—165 年间；它源于当时正在发展中的犹太人反对安条克四世的斗争；这些故事的作者可能暗示了迦勒底人、美地亚人、波斯人和希腊人的帝国；替代了它们并永久存续的第五帝国，以某种方式与对犹大·马喀比 (Judas

---

\* 本文译自：Joseph Ward Swain, “The Theory of the Four Monarchies: Opposition History under the Roman Empire”, in *Classical Philology*, Vol. 35, No. 1. (Jan., 1940), pp. 1–21. 感谢刘晨光对译文提出了若干修改意见。

[1] 《但以理书》，2: 31—45 以及 7: 1—14，尤其对比 14。（这段圣经引文采用了《圣经》[新标准修订版]的译文。——译注）

Maccabaeus)的预期性胜利有关。<sup>[2]</sup> 众所周知,从早期开始,基督教作家就认为这些段落指涉基督或教会;但迄今为止以下事实几乎没被注意,即四大帝国将被一个更为荣耀的第五帝国取代这一历史哲学,早在基督诞生、甚至安条克四世时代之前,就已在异教作家中出现很久了。

我们手头瓦勒里乌斯·帕特库鲁斯(Velleius Paterculus)的文本中的一个段落,表明了这一理论在西方出现得有多早。它很简短,不妨全段引用:

4

埃米利乌斯·苏拉(Aemilius Sura)在他论述罗马年代学(the chronology of Rome)的书中说:“亚述人在所有种族中第一个获得了权力,接下来是美地亚人,然后是波斯人,再接着是马其顿人。然后,当起源于马其顿的两个国王——腓力和安条克三世——被彻底征服,迦太基也于不久被摧毁之后,罗马人获得了绝对的统治权。从第一个获得权力的亚述国王尼努斯的统治开始到这一时期,中间间隔了 1995 年。”<sup>[3]</sup>

这一段落长久以来被视为一个注解,而非瓦勒里乌斯本人的作品。我们无法知道究竟是谁以及什么时候将之引入了他的文本,也不知道它源自何处;但非常清楚的是,这则出自某位古代作家之手的片断是真

[2] 不同时期提出的四帝国之身份证明的概要,参看 H. H. Rowley:《美地亚的大流士和〈但以理书〉中的四个世界帝国》,Oxford,1935。

[3] “Aemilius Sura de annis populi Romani: Assyrii principes omnium gentium rerum potiti sunt, deinde Medi, postea Persae, deinde Macedones: exinde duobus regibus Philippo et Antiocho, qui a Macedonibus oriundi erant, haud multo post Carthaginem subactam deuictis summa imperii ad populum Romanum peruenit. Inter hoc tempus et initium regis Nini Assyriorum, qui prinoeps rerum potitus, intersunt anni MDCCCCXCV.”(瓦勒里乌斯·帕特库鲁斯,i. 6. 6.)。

实可靠的。除了这一残篇告诉我们的之外,关于苏拉本人我们也一无所知。他的名字暗示了他是一个罗马人。中间间隔 1995 年表明他受到埃拉托斯特尼的《年代学》(*the Chronology of Eratosthenes*)和提细阿斯的《波斯志》(*the Persica of Ctesias*)的影响: 苏拉遵循了提细阿斯的陈述,<sup>[4]</sup> 即亚述建立于特洛伊陷落之前 1 000 年,并接受了埃拉托斯特尼关于特洛伊陷落的时间(公元前 1184 年),将亚述建立的时间确定在公元前 2184 年(即西庇阿在马格尼西亚获得胜利,罗马在亚洲确立统治权之前 1995 年)。事实上,苏拉把第二次布匿战争——在击败安条克三世之前不久——作为推翻迦太基的时间表明他的写作在第三次布匿战争之前,他把腓力作为马其顿终结的标志则说明他写作于第三次马其顿战争之前。由此我们可以断定苏拉的作品写作于公元前 189—前 171 年间。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罗马的整体智识环境证明这一时期比更晚的时期更为可能;此外,少量的语言学证据也有效地证明了这一点。<sup>[5]</sup>

从与苏拉同时代的诗人恩尼乌斯(Ennius)的《编年史》(*Annales*)残篇中,也可以看到罗马与东方世界帝国(world-empires)的这种关联。古

---

[4] 提细阿斯,转引自西西里的狄奥多鲁斯的《历史文库》,ii. 22. 2。当然,马格尼西亚战役是在公元前 190 年获得胜利,但苏拉从公元前 189 年缔结和平协议时计算起。

[5] 伊利诺伊大学的 W. A. Oldfather 教授从语言学的视角恰当地检讨了苏拉的这一残篇。他认为,尽管语言学的证据不足,但残篇暗示了属于一个较早的时期,肯定在共和国时代,或许还在其临终岁月之前: 两次使用 *princeps* 一词表示“首次做一件事情”,这是较早的用法,后来的作家通常说 *primus*; *oriundi* 同样是一种早期的用法;*exinde* 的使用尤其是罕见的和早期才有的。尽管这些语言学论证并不能证明一个像公元前 171 年那样早的日期,但仍明显地暗示了这一段落是“共和时期的”拉丁语;其他类型的证据证明这一日期只可能在共和国时代也表明苏拉的观点是有道理的。但是,这些考虑对于上述文本中展开的年代学论证是次要的。

代作家经常将各种各样的事件置于一个单一的日期下,以便暗示它们之间存在着某种(被信以为真的)内在联系。比如说他们宣称萨拉米海战和希梅拉(Himera)战役恰好发生在同一天,<sup>[6]</sup>或者认为迦太基和罗马在同一年建立。<sup>[7]</sup>恩尼乌斯的这一残篇(写于作者公元前172年去世前不久)表达了他的信念:罗马大约建立于他生活时代之前七百年。<sup>[8]</sup>毫无疑问,他心目中罗马建城的时间是公元前880年,即通常人们认为亚述帝国衰亡的那一年。将亚述的衰亡和罗马的建城视为同时发生是一种表明罗马是亚述的真正继承人的方式,这种方式暗示了一种与苏拉观点相类似的帝国继承理论。我们将看到,这种年代学的(chronological)方法在后来的时代被某些作家用来处理四个帝国;<sup>6</sup>恩尼乌斯表明,甚至在他的时代,这一理论就已经在罗马为人们所知晓。

因此,在马格尼西亚战役之后不久,某些罗马作家就宣称他们的城市获得了作为亚述、美地亚、波斯和马其顿这四个世界帝国的继承人的位置。罗马近来的各种胜利使这一宣称正当化了;但是,将与东方伟大帝国的这种联系追溯到如此早的一个时期,其实是对罗马最大的奉承,并暗示了一种高度的确信,即一种光辉的命运正在等待着这第五帝国。这一关于帝国继承的理论毋庸置疑是在奉承,但令人惊讶的是在罗马发现了对它的提及,(因为)罗马在当时的智识视野几乎没有涵盖遥远的亚述。那么,为什么一个罗马作家要处心积虑地将刚刚从扎马和马格尼西亚兴起的罗马帝国的历史根基置于古代东方呢?真实的情形或许是,一个外国人将这种帝国继承的观念介绍给了苏拉,苏拉被这种观念蕴含的情绪所感染而接受了这一理论。

[6] 希罗多德:《历史》,vii. 166。

[7] 《蒂迈欧篇》,转引自哈利卡纳苏斯的狄奥尼修斯的《罗马古史》,i. 74. 1。

[8] 参见《编年史》,残篇 501。

接下来的问题是,苏拉从哪里得到了他的这份清单?在他们的帝国主义晨光熹微之际,许多罗马人把希腊人视为智识领袖;但我们马上将看到,这幅世界历史略图所暗示的观念随后并未在希腊人中流行,对他们而言,这种观念没有多少意义。同样,这份清单也非埃及人的。四个帝国都是亚细亚的,因此清单也可能具有亚细亚的起源。在这么早的时期,罗马人很少或几乎没有和叙利亚或巴勒斯坦发生联系,<sup>[9]</sup>但他们已经与小亚细亚的许多部分发生了接触。由此我们可以猜测,四帝国理论是由小亚细亚传入罗马的。或许这份清单就是由一个参加了西庇阿指挥的马格尼西亚战役的罗马人偶然得到的。我们接下来就将看到,有足够的根据怀疑这一根本性的观念随即在战场最附近的地区传播开来。亦或许这份清单是由某个想奉承罗马人的东方人(甚至一个希腊人)从小亚细亚带到罗马的:根据波里比乌斯,<sup>[10]</sup>我们立即想到这可能是油嘴滑舌的帕加玛和罗德岛使节在和平谈判时期所作的迎合罗马的宣传。

但是,必须补充一点,将帝国的发展追溯到从亚述经美地亚和波斯到马其顿和罗马的这种历史观是如此陌异和富于异国情调,以至于不能对当时罗马人的思想产生深刻的影响。而且,在罗马有教养的阶层中迅速产生了一种根本性的转变,他们使这一东方理论变得比先前较不容易让人接受。在公元前3世纪后期和公元前2世纪的头二十年,罗马的理智阶层已经拜倒在希腊人的石榴裙下,并竭尽全力将希腊文化引入意大利。但是,在公元前170年代期间,这种态度发生了变化,罗马人开始对希腊人在文化方面的垄断感到不满。老一辈的历史学家,比如说法比乌斯·皮克托(Fabius Pictor),已经从希腊那里学到了他们所

---

[9] 苏拉写作于第三次马其顿战争(公元前171年)之前这一事实排除了犹大·马喀比的使节(公元前162年)将四帝国理论传入罗马的可能(《马喀比上卷》,第8章);而且,这些使节也从来没有将第五帝国等同于罗马。

[10] 波里比乌斯:《通史》,xxi. 18—24;李维:《罗马史》,xxxvii. 52—56。

能学到的一切，并试图从希腊人的眼光将罗马人的行动正当化，甚至他们也经常用希腊语写作。但是，年轻一辈的作家——他们当中最引人注目的发言人和历史学家是监察官加图(Cato the Censor)——则采取了对立的态度，力图将他们的著作变得非常罗马化，并表达了对希腊人以及模仿他们的罗马人(“Greeklings”)的蔑视。<sup>[11]</sup>苏拉明显属于老一辈史家——他写作于公元前171年以前这一事实可以附带证明——并且尽其所能地从希腊人和东方人那里学到了关于年代学和历史的知识；但是新一代作家并不认同他的观点，也不准备无限延续他的历史发展观。在此后一百多年的时间里，我们在罗马再没有听到任何关于四帝国理论的说法；而且，当这一理论重新出现时，它的支持者通常将它用于批判而非赞美罗马帝国主义。但是，苏拉的简要清单证明了在犹大·马喀比反叛和《但以理书》写作之前数年，四帝国的哲学就已经在罗马为人们所知晓了。

## 二

希腊人对亚述、美地亚和波斯帝国的继承非常熟悉，在公元前5世纪的第三个二十五年期间写作的希罗多德<sup>[12]</sup>和在公元前4世纪的第一个二十五年期间写作的提细阿斯<sup>[13]</sup>都曾论及这一问题。但是，不论

[11]关于公元前175年罗马历史写作的特征和精神的转变，参看 M. Gelzer：“法比乌斯·皮克托史撰中的罗马政治”(Römische Politik bei Fabius Pictor), *Hermes*, LXVIII (1933), 129—166，以及“罗马史传的兴起”(Der Anfang römischer Geschichtsschreibung)，同上，LXIX (1934), 46—55；F. Klingner：“李维著述中的罗马史撰”(Römische Geschichtsschreibung bis zum Werke des Livius), *Die Antike.* XIII (1937), 1—19；关于一般的理智革命，参看 F. Altheim:《罗马历史的诸时期》(Epochen der römischen Geschichte), Vol. II (1935), Part III：“思想潮流的变革”，其中第305—313页讨论了历史编撰。

[12]希罗多德：《历史》，i. 95, 130。

[13]参看西西里的狄奥多鲁斯在《历史文库》中对提细阿斯的摘录，《历史文库》，ii. 1—34。

在这些章节还是其他地方,希罗多德都很少谈及亚述,很明显,他认为亚述并不重要;希罗多德并不相信亚述和美地亚拥有一个世界帝国;甚至波斯,他也认为直到冈比西斯征服埃及为止,才获得了亚洲的霸权。相反地,希罗多德对埃及给予了更多的关注,埃及帝国是很重要的,值得注意,尽管它并未出现在苏拉的清单中。提细阿斯更详尽地记述了这三个亚洲帝国。根据他的故事,第一个亚述国王尼努斯和他的妻子塞米勒密斯(Semiramis)拥有一个真正的世界帝国,这个帝国的疆界从印度延伸到埃及和爱琴海。其后,美地亚人推翻了亚述帝国,波斯人又推翻了美地亚帝国。提细阿斯的作品被广泛阅读,在整个古代时期,他的观点构成了古代东方的古典历史基础。希罗多德在他的美地亚年代学方面令人惊异地精确,<sup>[14]</sup>但提细阿斯的奇异描绘被后来的年代学家

---

[14] 希罗多德列举了四个美地亚国王,他们共统治了 150 年,直到公元前 558 年最后一个国王被居鲁士征服。根据希罗多德的年代学(i. 102, 106, 130),这些国王是:戴奥凯斯(707—655),普拉欧尔铁斯(654—633),库阿克撒列斯(632—593)和阿司杜阿该斯(592—558)。戴奥凯斯曾被等同为 Daiaukku, 萨尔贡(Sargon)在 715 年提到过这位“Mannai 的总督”(A. T. Olmstead:《亚述史》,[1923],第 245 页);根据希罗多德,戴奥凯斯在开始统治之前是一个杰出的人,这使得萨尔贡貌似有理地将他成为国王的时间提前了八年。此外,希罗多德的记述认为,亚述是在库阿克撒列斯时代被美地亚人和巴比伦人推翻的,现代研究显示,在公元前 612 年摧毁尼尼微城的行动中,库阿克撒列斯(Huvakhshatara)支援了巴比伦人,也证实了这些细节(Olmstead,前引书,第 636 页及其后)。另一方面,提细阿斯列举了九个美地亚国王,与希罗多德列举的全然不同,他们的统治时间超过了 282 年(或许是 320 年),并且,他们当中的第一个统治者推翻了亚述的统治。因此,亚述帝国大约衰亡于公元前 880 年,从公元前 2180 年建国后共延续了 1300 年。确定这些日期是不可能的,因为提细阿斯关于美地亚末代国王的统治时间并未在狄奥多鲁斯的残篇中发现(ii. 32. 5—6; 34. 1; 34. 6);或许可以假定他统治了 38 年,就像另外一份似乎出自提细阿斯之手的清单认为的那样。在另外的一段中,提细阿斯认为亚述建立于特洛伊陷落之前 1000 年;2180 年已经非常接近埃拉托斯特尼关于特洛伊陷落的时间(公元前 1184 年),而且,刚才提及的年代学可以这样根据 2184 年计算出来。

特别是卡斯托尔(Castor)<sup>[15]</sup>稍作修改后才接受,正是他把它们传给了阿非利加努斯(Africanus)、尤西比乌斯(Eusebius)和杰罗姆(Jerome);它们因而直到19世纪还继续困扰着东方学者。希罗多德大概在他旅行期间从完好的波斯原始资料中获得了关于这些事情的信息,<sup>[16]</sup>然而提细阿斯却未经批判地轻信了他生活时代——他曾作为宫廷医生为阿塔薛西斯二世服务了数年——的波斯帝国中流行的各种大众历史、传说和神话。无论如何,亚述—美地亚—波斯的继承顺序必定是一种波斯人看待事物的视角;巴比伦人将会说亚述—迦勒底—波斯,埃及人也会有另外的排列顺序;但波斯人自然地将他们的近亲美地亚人,而非迦勒底人或其他人,作为他们的先驱,并且他们相信亚述是被这些美地亚人所征服,而非像现代历史学家所说的那样主要是被迦勒底人所征服。希罗多德宽广的世界视野使他能够恰当地将这种继承作为地方史的一个阶段;但提细阿斯在重述他从波斯宫廷中听到的一切时,将之夸大为世界史,并将与他的雇主万王之王(the King of Kings)的骄负相当的一个世界权力实体归入从尼努斯到他自己时代的整个统治者谱系中。

当亚历山大推翻波斯帝国时,在这份世界帝国的清单上添加第四个名字是极其容易的;但四帝国的传统仅仅扎根于亚细亚或亚历山大王国的塞琉古王朝部分。波斯在埃及的影响从未深入,通俗历史继续回溯到法老们(Pharaohs)的旧时代:亚历山大和他的继承人都从未宣称以波斯继承者的身份统治埃及,而是将他们自己作为一个新的埃及王朝统治者。同样的,在希腊,历史记忆仍一如既往并追溯到特洛伊战争。但是在亚洲,亚历山大和他的继承人宣称继承了大流士三世的统

---

[15]参看施瓦茨(Schwartz),前引书,第8、19、94页。

[16]雅各比认为,“极有可能的是”,希罗多德从狄奥尼修斯的《波斯志》(Persica)中取材(参见《Pauly-Wissowa 古典百科全书》中的“Herodotus”词条),但是他没有提供任何证据。即使这一假设是正确的,材料也最终来源于可靠的波斯原始资料。

治。因此,我们没有在埃及和希腊发现关于亚述、美地亚、波斯和希腊四个世界帝国的说法:这样一种继承没有任何意义,因为它并没有给古代埃及或亚历山大之前的希腊提供一个重要的位置。如果博学的学者们偶尔谈到前面三个帝国的继承,那么他们也是在希罗多德而非提细阿斯的意义上谈论的。但是在亚洲,四帝国的观念抓住了大众的心灵,并且像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在公元前2世纪获得了文字性的表达。然而,没有证据表明塞琉古王朝或他们的支持者曾将他们的权力追溯至尼努斯:当这一理论被使用时,它采取了一种全新的形式,并被用于反对希腊人。至于这一转变的由来,需要我们进一步作出解释。

尽管亚历山大和他的继承人试图将希腊人和东方人统一为一个民族,但结果并不成功。大约公元前3世纪中叶,东方开始起来反对希腊主义(Hellenism),正是这些暴动最终导致了塞琉古王朝的毁灭。帕提亚人(Parthians)在公元前247年获得了独立。在王国的各个部分,安条克三世(公元前223—前187年)不断受到暴动的困扰,这些暴动常常是由利用本国内乱以自肥的希腊将军领导的,比如莫隆(Molon)在美地亚以及阿开俄斯(Achaeus)在小亚细亚的例子。后来的反叛者娶了卡帕多西亚的米特拉达梯(Mithradates of Cappadocia)的一个女儿,米特拉达梯是一个旧波斯贵族的后裔;“在大众的建议下”,米特拉达梯于公元前220年擅自在吕底亚称王,掠夺并与希腊城邦为敌,并得到了东方部队和将领的援助,成为塔苏斯(Taurus)西部最有权力和难以对付的人,直到公元前213年才终于被俘获并在撒尔迪斯处死。<sup>[17]</sup>安条克三世在马格尼西亚惨败之后,混乱变得普遍了,他本人被一群暴徒在Elymais谋杀。他的儿子塞琉古四世,也被他的东方首席大臣赫利奥多鲁斯(Heliodorus)在公元前175年杀害。而塞琉古四世的继承者安条克四世,则经受了犹大·马喀比的暴动,并且,当安条克四世在公元前163年

---

[17]引文参看波里比乌斯:《通史》,iv. 48. 10。

12

突然死亡时,犹太人和非犹太人(Gentiles)都谣传他是被上帝之手(the hand of God)杀死的<sup>[18]</sup>——这是反对他的感情的一种确切表征。如果我们能够对公元前250—150年间这段纷乱时期的历史有更好了解的话,肯定能够听到许多小犹大(little Judases)的名字(他们中的许多远在伟大的犹大·马喀比之前)出现在广阔的塞琉古帝国的不同地区。晚近的研究揭示了在这些暴动期间出现的许多有趣的宣传蔓延开来例子。<sup>[19]</sup>从莫隆时期开始,出现了启示录式作品(apocalyptic writings)、肝脏预兆、先知预言以及胜利的赞歌。这些宣传暗示了一种关于启示性要素(apocalyptic element)的解释,它们现在开始出现在四帝国理论中。古老传说中的三个帝国都是东方的;它们曾被引用来荣耀东方的波斯诸王;并且东方民族将这种继承与他们早先的国王们联系了起来。但第四个帝国的统治者是异族:东方人随即开始把目光转向第五个帝国,这个帝国将推翻希腊人的统治,并且古老的东方体系也将在这个帝国下得以恢复。或许并不需要太多就足以表明,甚至在安条克三世时代,这些其他犹大的但以理们不时提及,继四帝国之后的第五帝国在上帝之手下将成为普遍而永恒的。这一假设至少说明了理论在像巴勒斯坦和小亚细亚这样的帝国内部广泛分割之地本质上同时代的面目。

这些叛乱发动于大夏(Bactria)和帕提亚并逐渐向西推进,这一事实似乎进一步有道理地表明四帝国理论自身起源于波斯:理论随叛乱而推进。若干年以前,迈耶从《但以理书》中对巨像的描述与某些帕西人(Parsee)著作中的段落存在着惊人的类似这一事实推断出四帝国理论的波斯起源,这些段落——写于穆罕默德时代早期,但构思更早——描述了分别由金、银、铜以及混合了泥土的铁所表征的四个世界时代

[18]《马喀比下卷》,9: 5;波里比乌斯:《通史》,xxxii. 9。

[19]A. T. Olmstead:“新旧约研究”(Intertestamental Studies),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LVI(1936), 242—257。